

44.654
DHS

236942

潘 虎

邓 洪讲述 胡 旷整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



潘 虎

邓 洪讲述

胡 旷整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

潘 虎

邓 洪 讲 述

胡 旷 整 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井冈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times 1092\frac{1}{32}$ 印张 $3\frac{1}{8}$ 字数 5.5万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10110·92 定价: 0.20元

目 次

编者的话.....	(2)
第一个风浪.....	(3)
潘虎.....	(10)
在敌占区.....	(22)
第一次见毛主席.....	(29)
一支武装交通队.....	(34)
山中历险记.....	(48)
一件案子.....	(69)
警卫员鲁德春.....	(75)
钟强.....	(86)

编 者 的 话

革命老同志邓洪，原是我省副省长（一九六九年病逝），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湘鄂赣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由他口述、胡旷同志整理的这些回忆录，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湘鄂赣地区的革命斗争生活，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歌颂了革命前辈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战斗业绩，是向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这些作品，文化大革命前曾在我社《红色风暴》和其他出版物中发表过，在读者中有过较大影响。现收集成册出版，以飨读者。

第一个风浪

大革命时期，我在自己家乡——浏阳县五十四乡当农民协会委员长。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马日事变)之后，五十四乡农民协会曾一度把旗子放了下来，但第二天又挂上了，而且工作更加紧张起来。纪念“五卅”的那天，五十四乡组织了几千人参加所在普迹区的示威游行。但时局越来越严重，地主、富农、流氓、绅士乘机进行扰乱，到处散播谣言，说长沙派了多少多少军队进攻浏阳；说某处某处搞农民协会的人都给砍了脑袋；说菩萨显灵，要收拾服从农民协会的人；还编出歌子吓唬妇女：“巴巴头，万万岁；西装头，要枪毙”；准备分田所插的牌子给拔掉了；准备修路所钉的桩子也给挖掉了……人心非常摇动，有人在发动重修被打掉了的神像，妇女们都在后脑勺上扎起假髻子来，以前有事没事要到农民协会走走的人这时不敢迈进农民协会的门坎了，还有一些以前爱哇啦哇啦的人这时只敢侧着眼睛瞟人，嘴巴却闭得紧紧地了。至于那些地主、绅士之流则是另一副神态，早些日子他们老远看见我总要设法躲开，现在却

故意往我身边走，装着满脸奸笑，把腰弯得低低地：“呃呃，委员长，您忙哪。”

有些关心我们来劝我：

“再搞不得呀，风色不对呀！”

“撒手吧，人家在嘀咕着要对付你哩！”

但是我不相信革命就会这样失败。马日事变前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了十来天党课，懂得了关于阶级、关于剥削的问题，懂得这个世界必定要变，懂得苏联革命已经成功，因而相信只要有党在，革命就一定压制不下去，而且一定会胜利。我感谢那些关心我的人，但拒绝了他们的忠告。

大概到了六月中旬，局势愈加恶化，附近乡村、集镇的反革命分子公开进行活动了，这里捣毁工会农会，那里抓捕革命干部，有的地方还开始了杀人。而我们这时还在准备进攻长沙。区上指示五十四乡要动员青壮年参军，还要集中所有的鸟铳。反革命分子利用这机会又向农民进行煽动：“背起鸟铳梭标去攻长沙？去掳炮子呵！”因之有天晚上为动员青壮年参军开群众大会时，群众都召集不拢来。三催四请，来了一些人，但满会场嗡嗡唧唧，都各自开着小会，台上讲话也没人听。看见形势不好，我讲了几句话就离开了会场，跑去找分区农民协会委员长黎梓阳请示办法。黎梓阳也拿不出主张，只说这是区上转来县里的命令，一定要执行。

第二天半上午，我正在考虑如何继续动员攻长沙的问题，区上派了两个人来催收富农钟复初所欠的罚款，一个穿自卫队的军装，背一支步枪，一个穿便衣。穿军装的那个看

见我时做了一下暗号，表明他是党员。我把当地情况告诉了他们，要他们谨慎，他们就到钟复初家里去了。

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叫陈长的农民气急败坏地跑来找我：“委员长呀！不得了！不得了！钟复初他们把两个催款的人捆起了，把枪也缴下了！”

仿佛一个粗大的棒子在我头上猛击了一下似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响起来。

“人呢？”

“关在我家谷仓里。”

“钥匙拿走了？”

“不，在我家里。枪也在我家里。他们还到各处喊人去了。”

要来的事终于来了！现在这两个人，我若不救他们，就很可能要遭毒手；但我若把这两个人放走，那么我自己就要做“战綦阳”里面的纪信了。怎么办呢？我想，分区农民协会有四支枪的自卫武装，只有把那四支枪请来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要陈长赶快回去，不要给人把钥匙拿走，自己随手抓起一把铁尺（一种旧式武器）往腰上一插，拔腿就往分区跑。分区相隔只有一里多路，一口气就跑到了。

不凑巧，分区的四名自卫武装都派到外面去了，连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出去了，只有黎梓阳一个人在家。黎梓阳听了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汇报之后也很紧张，想想说：

“你去把他们放掉。”

“放掉了，人家不杀我？”

“不怕，不怕，他们不敢的。”

显然，这句话也只是壮壮我的胆而已，他也未必有什么把握。但是问题总得要解决呀！我是个共产党员，能坐视两个同志陷入虎口而不救么？不能！我要救他们！时间不容许多作考虑，我拔腿又往回跑。跑到陈长家里，打开谷仓把两个人放了出来，枪也拿来还给了他们。但这时还不能要他们走，因为走更危险，可能在路上给人杀掉。有事我来挺吧，我把他们带回农民协会。

在我开仓的时候，钟复初已经串连好多人到路上来了。一听说我开仓放人，他就唆使流氓赖四、赖六在村子里大声嚷喊：“走呀，不愿到长沙去送死的就跟我来呀。”等我们走到农民协会，还没进屋子，就有几千人拥了上来，里一层，外一层，把我和两个催款的同志包围在坪子上，把我的铁尺也夺了，十几支雪亮的梭标挺到我身上。

“你这家伙，知死活么？”流氓赖四咬着牙齿指着我说：“死到眉毛尖上了，你还不晓得呀？”

坪子上人越聚越多，四面还在来人，脚步声，叫喊声，闹成一片。这时脑子里忽然闪过五月初间一次分谷子的大会场面。大概由于只有那次大会才比得上今天这样的热闹吧。

五月初间，夏荒开始了，许多人家没有饭吃，跑来找我：“委员长呀，怎么办啦，没有吃的啦。”“委员长呀，帮我向谁家借点谷子吧，挂了锅啦。”我一方面同情他们，一方面感到自己作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责任，于是要村里首富周梅村拿出谷子来救济饥荒。听说周梅村拿出谷子来，那

些小地主、富农也纷纷拿出谷子，总起来数目相当大。那天，也在这个坪子上，开群众大会分谷，赤贫的每家五箩，次贫的三箩。有人提议要分几箩谷子给我父亲，我坚决拒绝了，虽则我家也缺少粮食。群众欢天喜地，兴高采烈；也象今天一样，里一层外一层把我围住，脚步声，叫喊声，闹成一片。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代替群众的作法是错误的，但当时我没有这个认识，倒以为自己帮助了群众。而现在，时间还不过一个多月，今天上午他们也许还用那三箩五箩谷的米煮了饭吃吧，他们却端起梭标要杀我！不由得心里愤慨起来。

我圆睁两眼环视前后左右，发泄我的气愤。可是，看见围在我身边的只有十几个人，大都是流氓、地痞或与地主、富农有关系的人，其余的都离开好几步站在四周，有些人还显得很焦急，看来是在为我担心。我想，这些人不会都是来杀我的，有些人也许还是想来帮助我吧，只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们无法伸出头来。于是我立刻想起了几句打动群众的话：

“农友们！”这是当时惯用的称谓。“你们要杀我，可以，不过要让我讲几句话。”

坪子里静了下来。我接着说：

“自从去年九月成立农民协会以来，我没有脱过草鞋睡觉，成天成夜，跑东跑西，给农民协会做事；我没有拿农民协会一个钱的工资，没有吃农民协会一顿饭。五月初间打土豪，谷子都分给大家，赤贫的五箩，次贫的三箩，我七十多岁的父亲没有要一粒。我这个人，该杀么？”

我一口气说到这里停下来，拿眼睛向四周望去。有的人一接触到我的视线就低下了头，有的人好象要流眼泪，有的人现出了愤怒的脸色，而挺在我身上的梭标也有了摆动。于是我的胆子大了。我继续讲话，把嗓子往高处提，语调放慢：

“如果说，我对大家不起，没有给大家多做事，该杀，那么，好，你们杀吧！”

说着，我把胸膛一挺，那些抵在我身上的梭标连忙缩了回去，生怕给我的肚子碰着了似的。于是我的胆子更大了。现在我必须抓紧时机赶快脱身。我想只有把他们带到分区去，那里有“洋枪”，又是外村，他们是不敢胡乱来的。我说：

“这两个人是分区黎委员长叫我放的。你们要杀我，也要让我跟黎委员长见一个面。”

这时群众里面就有人说话了：

“既然是黎委员长要他放的，那就能怪他，我们找黎委员长去。”

好多声音附和，有人还叫把武器交还我，铁尺就回到我手上了。于是我用手向那两个催款的同志一招，抬步就向分区走。挡在前面的群众马上闪开一条路来，让我走在前面，就象往常到普迹镇上去游行一样。

到了分区，那些流氓、地痞都往后面缩。黎梓阳往台阶上一站：

“你们糊涂！县里，区上，有的是兵。你们想造反，有

几个脑袋？回去！回去！委员长留下。”

赖四、赖六几个人似乎想讲什么，看见群众乱了阵，就偷偷地溜了。

等那两个催款的同志说尽了感谢的话走了之后，黎梓阳（后来叛变了）就对我说：“你不能在那地方站了，风浪来的大，你要避一避。”

看情况，我是不能再在五十四乡了。我要求留在分区，黎梓阳不肯，说分区也快站不住了，并要我快走。往哪里去呢？到处都在骚动！而且我身上只有一毛钱！好在我有修钟表的手艺，把修钟表的箱子提上吧。

晚上我回到家里提了箱子出来。走过五十四乡农民协会时，星光下看见农民协会的旗子还没收起，在风里展动，发出蒲拍蒲拍的响声。我走到旗子前面停了一下，默默地想：

“你撑着吧，我不久就要回来的。”

潘 虎

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以修钟表为掩护，在浏阳县的镇头市从事党的秘密活动。这时，湘东北各地到处都有党的地下组织，到处有党领导的游击活动，有的地方还发生群众的自发暴动，革命的浪涛正在湘东北地区汹涌澎湃地激荡着。驻在镇头市的反动地方团队查获我们准备暴动的两布袋红色袖章，认为我有嫌疑，把我逮捕了。幸喜没被抓到什么证据，又找到有力的保人，我才得从虎口中逃脱出来。

但由此一来，我就不能在镇头市呆下去了，因此决定到醴陵县去。镇头市离醴陵九十里，我找了一个叫李春生的人一道去。他是我职业上的同伴，不是革命同志。我们都穿着雪白的竹布褂裤，撑着漂亮的布伞，提着小小的修钟表的工具箱，这是作为钟表匠所需要的装束。

我们一大早出发，出镇不远，就有一个农民跟在我们后面同行，背上背一个布袋，看样子是从镇头市买东西回乡下去的。这人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坐下休息，他也休息，我们走，他也走。

半上午，到了一个名叫石回嘴的地方。这是一个小集

镇，只有十多户店铺。我们坐下休息时，那个买东西的农民却没有照例跟着坐下来。一会，另外来了两个农民，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情，从哪里来，最后用邀请的口气说：

“我们队长请你们去谈谈。”

前不久，听说石回嘴搞起了一个红军游击队，但我没有和他们发生过直接关系。当时湘东北党组织为了便于不相识的同志之间必要时的相互联系，规定得有一些联络暗号和暗语。我想，既然是红军游击队，凭暗号暗语一定可以沟通关系。于是大胆同那两个农民去见队长。李春生却害怕起来，两眼张皇地望着我，脸色铁青。

走到一个屋子门口，有一个手持梭标的农民站岗，手臂上挂了一个红袖章，他望望我和李春生，又向那两个喊我们来的农民眨眨眼睛。再往里走，厅堂里很肃静，只有一个彪形大汉昂头挺胸坐在一张椅子上。那大汉粗眉毛，大眼睛，满腮胡子，黑里透红的脸色，穿一身青布的普通对襟短装，腰上挂支手枪，枪柄上满把的红缨，一见我们就指着喝道：

“你你你你们是什么人？”

他口吃，说起话来眼睛急的一个劲地眨动。

我把我们的姓名、籍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说了一遍。这当中，有几个人陆陆续续从屋子后面走了出来，也都是穿着老百姓衣服。

“你你你们是是是探、探子。”那大汉又指着我说。所谓探子，就是侦探，凭什么说我们是侦探呢？我有些

奇怪。我想大概是我们这身装束招惹了注意。我从从容容地回答他：

“报告队长，我们是修钟表的，不是探子。”

“你还还还强辩，我我我们昨天卜、卜、卜了卦，说今、今天有两个探探探子来。”说罢转向旁边的人喝道：“绑绑绑起来！”

看见他们真的要绑，我就一面申说，一面用手势做暗号。我张开五指把手一举，他们没有反应；我又把衣领向里一折，他们也没有反应；再用食指和拇指做成半个圆圈，还是没有反应。于是我用暗语问他们：“五大洲”是什么，他们答不出；又问“四大将领”是谁，他们也不懂。我心里慌了：这是什么游击队呢？

在我争辩着、做着手势的当中，他们已经把我们绑起来了。大概由于老是我一个人讲话，李春生没有做声，他们又把我一个人吊了起来，用大竹片敲打我，要我招认是哪派出的侦探；正是大热天，汗从头上滴下来，汇集到下巴尖上，象流水一样往下落。李春生被绑着两手站在一旁，只是哀哀地哭泣：“不得了呀！我家里还有娘呀！还有老婆孩子呀！”

我火了，仗着自己有组织关系，态度也就很强硬。我厉声问他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游击队！受哪里领导的？”

“我我我我们是红、红军游击队，我我我我自己领、领导的。”那蛮横的队长暴跳着。

“你们既然是红军游击队，为什么我刚才作许多联络暗号，你们不懂呢？告诉你们，我是个共产党员。”

“你你你你还强、强辩！”那队长大发雷霆，拿起一张磨得雪亮的侧刀往我脚下一丢：“请请请你直架。”

这是句江湖黑话，意思就是“杀你的头”。我不由一惊，但马上就镇静下来，依然态度强硬地说：

“我的头是不容易杀的，我是有组织的。你们要杀，也要等过三天，先派人到上级去查问清楚。”

那队长还要咆哮，旁边有人插进来问我：

“你在这地方认识什么人么？”

我立刻想起有个叫潘绍桃的钟表匠来，他的徒弟是我学修钟表的师傅。

一说出潘绍桃，他们就停止了拷打，互相挤了一下眼睛，那位队长首先走出去了，其余的人也一个一个跟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李春生两个。汗在脸上流着，好象很多虫子在脸上爬着咬着似的，全身衣服都湿透，脚底地上汗水成洼。我看看李春生，他似乎比我吊着的还难受，脸上没有一点人色。

过了一会，有几个人端着三个瓜瓢和饭甑碗筷之类来了。一个瓜瓢里盛着一个鸡，一个瓜瓢里盛着一条鱼，另一个盛着一个猪肘子。他们把我放下来，把李春生的手也解开了，叫我们吃饭。李春生还在哭泣，一点也不吃，我倒吃了个满饱。吃过饭后，又给绑起了，但没吊上。

忽然外面有人吆喝，只见一个农民推着一辆独轮车走

来，车子上堆着几个鼓肚袋子，车子后面跟着好些人。车子一停，有的人就搬起袋子往箩筐里倒，几个袋子都装的白米；另一些人却把那推车子的人按倒在地，用竹片鞭打他。那竹片是经过削制的，看得出是常用的刑具。

那推车子的人一面挣扎，一面嚎叫：

“副爷！不要打我呀！我不是土豪呀！我是他家里的长工呀！”

“谁叫你给土豪家做长工？”

“哪个叫你给土豪推车子？”

人们嘈杂地喝骂着。

那人又哀求说，他家里没田，不做长工就没饭吃。又说：土豪家里没有人推得起车子；他要不给推，这米就到不了游击队。

可是人们不由分说，毕竟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用马刀把所有的布袋都砍破了，把车子也劈掉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怎么他们是这么一种作风呢？而我，碰上这样一些蛮不讲理的人，又怎么对付他们呢？这时我才真的纳闷起来。

一会，来了一个人，他说他姓唐，叫唐福仁，堆着满脸笑容向我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误会了，害你们受了委屈。”

说着把我们手上的绳子解掉了。

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要求派人到浏阳第十六区（中坳）去了解。他满口答应。谈了一会走了，还是把我们留在